

From L. S. Yang

2 Prescott St.

Cambridge, Mass.



THIS SIDE OF CARD IS FOR ADDRESS

Dr. Hu Shih

104 East 81 St.

New York City

胡適

楊聯陞往來書札


學
談
詩
二
十
年



论学谈诗二十年

——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

胡适纪念馆 / 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胡适纪念馆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

ISBN 7-5336-2754-7

I. 论... II. 胡... III. ①胡适(1891~1962)—书信集②杨联升—书信集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17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事业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唐元明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6.125

字 数:350 000

版 次: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 000

定 价:24.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论学谈诗二十年

——序《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

1976年初,我还在哈佛大学和杨莲生师共同讲授中国史。在我生日那一天,莲生师忽然笑吟吟地持一包东西相赠,说是特别为我准备的生日礼。从礼包的外形看,我猜想是一本书,打开一看,原来是胡适之先生给莲生师五十多封信的复印本,共173页。我当时不仅惊喜出于意外,而且十分感动。因为我知道这都是他在哈佛燕京社的复印机上一页一页地亲手印制的。莲生师并且告诉我:他一共复印了两份,一份赠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一份赠我。我生平所收到的生日礼,以这一件最为别致,也最不能忘怀。

在他亲手装订好的信册扉页上,莲生师还有下面的题辞:

何必家园柳
灼然狮子儿
英时贤弟存念

联升持赠

一九七六年一^①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

时英时不惑已六年矣

① 编按:丙辰年元月廿二日应为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一日。

何必家園柳
灼然獅子兒
某時賢弟存念

陸陛持贈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時
某時不惑已六年矣

他在另一页的上端又题曰：“胡适之给杨联升的信，一九四三至一九五八。”这就是说，册中包括了这十六年中胡先生给他的信。这当然不是全豹，但大致可以说：这些信最能表示胡、杨两公之间的私人交谊，因此许多专门论学的长信都没有收入此册。

这些信都是适之先生在旅美时期写的，1943和1944两年属于前期，即在他卸任驻美大使，移居纽约的时期；1949至1958年属于后期，即他在大陆政局遽变后流寓纽约的十年。1958年他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便没有太多的空闲和莲生师通信了。

由于莲生师这一番赠信的因缘，今天我特别高兴能看到《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的问世。本书所收双方往来书札已十分完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陶英惠先生收集之功和刘国瑞先生的大力支持，是我们必须深深感谢的。陶、刘两先生嘱我为此书写一篇序，我自然义不容辞。

在这篇序文中，我想叙述一下胡、杨（以下皆省去敬称）交游的经过，以为读者提供一点背景的知识。他们相见始于何时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识起来，奠定了终身的师友情谊大概是在1943年。这一年二月，胡适到哈佛大学参加远东文明学系的“访问委员会”。(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先后住了5天，2月14日的晚上曾在赵元任家中和一些中国学生长谈（见《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影印手稿本，第15册，1943年2月11日至15日）。杨联升是赵元任最欣赏的一个学生，想必是其中之一。所以本年10月初胡适再到哈佛为美国陆军训练班（当时的正式名称是“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作六次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讲演时，他似乎已和杨很熟了。《日记》本年10月10日条写道：

与张其昀（晓峰）、金岳霖、杨联升同吃午饭，饭后同到 Dunster House（晓峰寓）大谈。

10月14日的《日记》又记：

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饭。同坐的杨联升、吴保安、任华，都是此间最深于中国文学历史的人。周夫人也是有学问的。……在纽约作考证文字，无人可与讨论，故我每写一文，就寄与王重民兄，请他先看。此间人颇多，少年人之中颇多可与大谈中国文史之学的。

这里已可看出胡对于周、杨诸人的赏识，但语气中也露出刚刚发现一批文史界后起之秀的喜悦。

但是胡和这批青年学人的交情发展得很快，到了第二年（1944），胡已打定主意要延揽周一良和杨联升到北京大学去任教了。1944年6月29日胡在日记中写道：

喜见新黄到嫩丝，
悬知浓绿傍堤垂。
虽然不是家园柳，
一样风流系我思。

戏改杨联升的“柳”诗，却寄杨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约杨、周两君去北大教书，他们都有宿约，不能即来。）（见《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页598。诗中“傍”字误印为“旁”，已据胡同日给杨的原信改正。）

6月21日胡致杨信之末说：

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肯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

这就是《日记》中所说的“上周去信”。此时抗战尚未结束，胡也还不是北大校长，但他已开始为北大的复兴设想了。如果不是他对于杨、周两位的学问已有十分深切的认识，胡是绝不会预作如此郑重的表示的。但周是燕京大学保送到哈佛的，必须先回燕京服务，杨则已应张其昀之约，去浙江大学任教，所以都“不能即来”。

杨和胡的交情则更比其他青年学人为深厚。这不仅因为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兴味也最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同兴趣很早便使他们两人的交情进入了不拘形迹的境地。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适正式接受哈佛远东系的邀请，教8个月的中国思想史，长期住在康桥，他和杨的关系便益发亲密了。据我所见到的一部分杨的未刊日记，杨不但旁听胡的思想史课程，而且等于作了胡的助教，代为选英文教材，并在胡外出开会时代他监考。（可参看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5册，页1854-1855，1865。这些资料都是杨提供的。）

诗的唱和似乎是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1944年12月21日杨陪胡下乡买一批老传教士留下的中国旧书，胡在日记中写道：

杨君在火车作小诗：

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庐。
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见《胡适的日记》，中华本，页608。)

胡的生日是12月17日，这一年有不少朋友从各地来为他祝寿，先后有两次大宴会，因此才有首句的“才开寿宴迎佳客”。但杨先生后来告诉我，此句的“佳客”原作“娇客”，戏指胡的美国女看护。胡笑了笑，把“娇”字改作“佳”字。这便是我所说的，他们的交情已不拘形迹了。后来为了买书的事，两人之间还续有唱和，这里不必详述了。杨在1945年1月29日日记中有一条简短的记载，说：

上胡课（按：指思想史）。呈阅四年来所作诗，请勿广布。

1949年4月胡适流寓美国，最初一年之内，心情十分黯淡，几乎从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了。这一年五月以后的日记最能看出他全无兴致的低潮心情。七月间杨写信给他便想用诗来解开他的心结。胡在7月27日的回信中说：

谢谢你七月二十一日信。
你劝我“多作几首诗”，这个意思颇新鲜，我一定记在心里。
可惜的是
 待等秋风落叶，
 那时许你荒寒？
诗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这种细致体贴的诗的感情，今天读来还能使人低回不已。

这种感情是相互的。胡对杨的关怀和爱护，也同样地无微不至。1958年3月4日胡给杨的信说：

收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压过高的现象，我很挂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听医生的话。……你实在太辛苦，得此警报是有益的。……那晚你来我家，我没听见你说起身体近状，只在你走后我颇责怪我自己“干么不让联升多谈谈他自己的工作，干么只管我自己的 talk shop!”现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说话固然太多，其实时间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来的你了，所以你说话特别少。

其实这已是杨在这年年底开始大病的朕兆，第二年他便入院长期治疗了。1959年4月27日胡在台北复杨报告病愈的信说：

今天在台大医院里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迹，高兴得直跳起来！拆开看了你说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这半年不用教书，还可以接着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写些短篇文字，但当爱惜精力，决不过劳”，我特别高兴！我一定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我们的许多好朋友。他们都很挂念。

从胡的这两封信——一写在杨的大病之前，一写于初愈之后——我们不难看到，胡对杨的健康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

胡、杨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止于诗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间几乎没有间断的论学往复。这里让我先说几句关于胡适作为一个学人的风格。胡适一生的活动面极为广阔，他的自

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尤其受到世人的注意，但从本质上看，他始终不失为一个学人。他一生最爱好的还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的研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学术兴味，而且终身以推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最大的乐趣。因此他随时随地留心人才，发现了人才之后则不断加以鼓励，并不辞“到处逢人说项斯”。同时他又深受现代价值的影响，完全接受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他对于后辈学人确能站在对等的地位上讨论问题，从不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1943年与杨联升、周一良等人订交以后，他们之间的论学，无论是口舌的或文字的，都体现了一种苏格拉底对话式的精神，而与中国的语录传统不同。胡适研究《水经注》一案始于1943年11月。在以后两三年的通信中，他曾为了其中梵文问题一再征询周一良的意见，也曾为校勘和考据的问题要杨联升替他严格地审查证据。1946年回到北平以后，他在百忙中仍然保持与周一良讨论学术，尽管后者在政治上已逐渐左倾。1948年秋天，他还写了一封长信与周商榷牟子《理惑论》的年代问题。这封信后来附在周的论文之后，刊于1950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上。胡适生前在中国大陆上正式发表的文字，这大概算是“绝笔”了。

四十年代胡适在哈佛结识的后辈学友之中，杨联升是相知与日弥深而且终身不渝的一位。1949年胡重返美国时，杨在西方汉学界已如旭日初升。胡对他治学的精博，极为推重，故每有所述作必与杨往复讨论。这一点在他们的通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说，杨是胡晚年在学术上最信任的人，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胡在“遗嘱”中指定杨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决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杨对胡则终身以师礼尊之，所以他给胡写信总是自署“学生”。杨是清华毕业生，但曾在北大“偷听”课。我猜

想他一定也旁听过胡在三十年代所开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可惜我当年忘记问问杨先生。)无论如何,杨在哈佛曾听过胡一学年的“中国思想史”,这是已证明的事实。他事胡如师,是顺理成章的。胡心中也未尝不视杨为他的学生,不过,在文字上未尝作此表示而已。“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这两句诗便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描写得恰到好处。

现代的师生关系是戴震所谓古代的师与友之间,做学生的已不能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更不容易做到恪守师说不变的地步。杨在治学方法上受胡的影响很深,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并不以胡所标榜的“科学方法”为治学的无上戒令。早年在清华时期,他已从陈寅恪治隋唐经济史,毕业论文(关于中唐的税制)便是在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圣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主张。后来陶为他的《汉学评论集》(英文文集)作序,说他是“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确不失为知言。故杨从胡游真能做到择善而从,而不致把胡的限制变作自己的限制。对于胡立说过当的地方,他往往献疑质难,不稍假借。例如有关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问题、《檀经》之“壇”是否“檀施”之“檀”的问题,杨都不同意胡的“大胆假设”。

但是杨在自己研究的范围之内向胡求教则往往得到“小扣大鸣”的效果。从1949年到1958年,杨的不少重要论著都曾获得胡的攻错之益,其中有关于考证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论点的。举其著者,英文论文中如南宋会子的考证、王莽新朝之“新”的涵义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报”的观念,中文论文中如《老君音诵诫经》考释及自搏与自扑考等,都在撰述过程中容纳了胡的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之间反复讨论所发挥的积极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上述几篇论文之所以严密周洽正得力于胡一方面攻瑕抵隙,

另一方面又倾其所知以相助。朱熹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于此见之。他们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一知性的乐趣，寓隽永于平淡之中，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世读他们的书信集的人是不能不为之神往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胡杨交游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他们之间从来不以政治为谈论的题目。这并不表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基本的分歧，而是因为杨是一位纯粹学院式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不但没有兴趣，而且视为畏途。他告诉过我，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曾当选为北平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那正是学生运动左右分化最为尖锐的时代。他这个主席一直处于左右两派学生的夹攻之中，吃尽了苦头。从此以后他便远离一切政治活动了。胡很了解他的性格和想法，所以只和他谈学问，绝不涉及政治。作为一个学人，胡的自由主义的重心也偏向学术和思想，与实际政治终不免有一间之隔。仅管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局势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抉择，但他的自由主义从未转化为政治行动。由于他是一个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做到让政治的归于政治，让学术的归于学术，使这两个领域不相混淆。

1945年12月17日是胡适五十四岁的生日，杨联升写了一副对仗工整但又很富于幽默感的寿联为他祝寿。联曰：

及门何止三千，更教碧眼儿来，红毛女悦；
庆寿欣逢五四，况值黄龙酒熟，黑水妖平。

据杨在12月9日的记事册上的记录，初稿文字与定稿颇有不同，最后四个字原作“白日旗飘”，以文字而论，自远不及改稿为工稳。但杨的日记又说：“十日与丁梧梓商改。”丁梧梓即丁声树，

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其时正在哈佛访问。所以我们已不能断定“黑水妖平”四字是作者自己的改笔，还是出于丁声树的建议。总之，杨虽然一生远离实际政治，却不是没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的人，1945年4月3日他曾特别注意海耶克那部轰动一时的《到奴役之路》；4月12日晚他又去听哈佛经济系和社会系的几位名教授讨论海氏的书。这一天正值罗斯福总统逝世，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悼诗，起句云：“章宪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钩”，正是颂赞罗氏的“大西洋宪章”。他的政治倾向还是很清楚的。这两天的记事为他的寿联提供了一种思想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和胡一样，也是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正是由于爱好罗斯福所揭示的“四大自由”，他万般无奈地做出了定居美国的抉择。然而也幸亏如此，他才躲开了政治的纷扰，在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里，穷年累月地博览群书，终于为西方汉学界放一异彩。

1949年胡适重返纽约时，当年哈佛校园中“可与大谈中国文史之学”的群英只剩下杨联升一人了。其余几位，借用胡的一句名言，不但都已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一册胡、杨书信集，真有说不出的意外喜悦。但从产生它的历史背景看，这一册书也未尝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劫后余烬。这一堆劫后残灰，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

在结束这篇序文之前，让我再回到个人的立场上说几句话。莲生师从游于适之先生之门是他生平最为珍惜的一段经历。1976年他赠我“何必家园柳”一句题词便显然借用了适之先生“虽然

不是家园柳”那首赠诗。1965年夏天他和我一诗云：

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
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

“古月”指适之先生，“寒梅”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饮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还是适之先生当年“说法”的一番锤炼。1977年我离开哈佛之前，他又对我说起他先后二十年和适之先生文字往复，受益无穷，乐趣也无穷。因此他希望我去后依然能继续我们之间长期论学的习惯。不用说，这也正是我所期望于他的。1985年我写《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除函札往返外，在电话上更和他长谈过无数次。最后他为该书写〈原商贾〉的长序则是他晚年最用力气的论学之作。他和适之先生互相攻错在他学术生命中所发生的创造性的作用，于此可见。他不惜以晚年衰病之身从多方面启发我，主要也是因为他要把他和适之先生的论学传统延长下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适之先生，但是我在学术专业上受惠于莲生师的则远比他得之于适之先生的既深且多。这已不是寻常感谢的套语所能表达于万一的。1966年我回到哈佛任教，这个新添的职位是他全力争取得来的。我终于没有能等到他退休便决定离开了哈佛，从私人情感上说，我对他的歉意是永久的。但是和适之先生一样，它具有异乎寻常的宽容精神。他不但没有半点介意的表示，而且尊重我的决定，鼓励我在学术上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从学术之为公器的一方面看，他肯定了我的决定的正面意义。这也是“何必家园柳”的更深一层的涵义。但是他早在1976年元月为我生日题词时，大概没有料到这五个字竟成为“一语成谶”的预言吧！

我写这篇序文时，莲生师逝世已满七周年了。他生前最重视中国文化中“报”的价值。但“报”字之义也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谨将此序献给他在天之灵，算是我对他一种最诚挚的回报。

1998年元月2日 余英时 敬序于
美国珂泉 (Colorado Springs) 旅次

编印缘起

胡适之先生交游甚广，除与朋友们经常有书信往来外，许多慕名者，以其平易近人，也曾写信向他请教问题。由于他有信必复，所以累积的函札数量，颇为可观。

1966年8月，台北文星书店编印的《胡适选集》中《书信》一册，系辑录各书报杂志中所发表的胡先生给别人的信，只有73封。因为他历年所保存和他人来往的信件，于1948年12月15日仓促飞离北平时，全都遗留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住宅里。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在胡宅，将其全部文件妥为保管，幸免于散失及毁弃之厄。1979—1980年，该所排印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作为“内部发行”资料，禁止携带出境。可是不久就流出了大陆。1982年10月，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率先参考该书并配合多年来搜集到的胡先生函札，开始发表并作注释，以〈从遗落在大陆暨晚年书信看胡适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为题，连载达两年之久。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也在同年12月赶印梁锡华博士选注的《胡适秘藏书信选》正篇及续篇。可见海峡两岸对胡先生函札重视之一斑。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耿云志教授主持下，将所藏胡先生的文稿及书信等，编印了42大本《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均照原稿影印，由黄山书社出版。其中第18至